

# 以求真之心 写至真之人

## ——评张恩岭《张伯驹传》

于华

(接上期)

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在为张伯驹《丛碧词》集所写的跋文中说：“如以词人之词而论，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，而以先生为殿——在他之后，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之词了。”此语一出，当年的文坛“众老皆惊”。周汝昌为什么会给张伯驹的词这么高的评价？因为周汝昌说：“伯驹先生的词，风致高而不俗，气味醇而不薄之外，更得一‘整’字。何谓‘整’？本是人工填作也，而竟似天成；并无一二草率也，然终无败笔。此盖天赋与功力，至厚至深……”

谈到张伯驹文物收藏的诸多往事，无需渲染，能做到真实再现也就非常“传奇”了。这是因为，1927年，30岁的张伯驹开始涉足收藏，其“起步虽晚，起点却高，底子也厚……家财万贯，使张伯驹的文物收藏有了雄厚的资本。同时，历史也为张伯驹提供了机遇”。例如，张伯驹得知溥儒（道光皇帝的曾孙）藏有西晋大文学家、书法家陆机所写的《平复帖》之后就决心收购这一国宝。该帖“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书法真迹”，被收藏界尊为“中华第一帖”“比《兰亭序》的书写时间还早79年，其珍稀性无与伦比”。张伯驹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已有“前车之鉴”——溥儒收藏的唐朝韩干的《照夜白图》这样国宝级的名画已被外国人买走并“流失海外”。这一事件“曾使张伯驹感到如同自己的孩子被拐走一样痛心”。于是，从1935年到1937年，历经两年多的磨难，在著名学者傅增湘的帮助下，张伯驹终于如愿以偿，得到了“旷代之奇珍”——《平复帖》。然而，怎能想到，1941年，张伯驹在上海突遭绑架，绑匪索要200根金条，“否则就撕票”。谈判过程中，当潘素见到绝食多日的张伯驹时，张伯驹并不在乎自己随时有被撕票的危险，反而怕潘素为了凑足赎款卖掉《平复帖》。“他悄悄对潘素说，宁肯死在这里，也绝不许变卖家中文物……”

而今，很多人都以为收藏文物是为了“牟利致富”，而张伯驹不惜身家性命收藏文物却是“为国留宝”。1956年初，为了响应支援国家建设“公债”的号召，张伯驹毅然把30年来以倾家荡产之资收藏的“晋陆机《平复帖》卷、唐杜牧之张好好卷、宋范仲淹《道服赞卷》等共计8件国宝级文物珍品无偿捐献给国家，珍藏于故宫博物院。

张伯驹为何能做出如此惊人壮举？读了书中著名民主人士章伯钧女儿记录的张伯驹“肺腑”之言“予所收藏，不必终予身、予予有，但使永存吾土，世传有绪”，怎能不为之击节赞叹！

然而，就在张伯驹捐出珍贵的8件文物的第二年（1957年），他被打成了“反党、反社会主义”的“右派”。

被打成“右派”的张伯驹日子当然艰辛而难过。但1978年对他大画家刘海粟说的一段话却又“令人肃然起敬”。张伯驹说：“我平生不会赚钱，全部积蓄，包括卖字的钱，都花在收藏上了。这些东西捐赠国家之后，我已成了没有资产的教授，靠劳动吃饭。戴什么帽子，我倒无所谓。一个渺小的凡人，生死得失，无关大局。但说我反党，实在冤枉。而且担心：老张献出这么多国宝，换了一顶‘铁冠’，传到海外，对党的威信不利——自己受了冤屈可以不介意，却为‘党的威信不利’而忧虑。

对于这样一个似乎特别让人喜闻乐见的“故事”，经“用心追求真实”的张恩岭多方核查，不但“至今尚无权威的资料佐证”，还找到了可以“佐证”真相的两个史实：一是中南海摄影师的回忆——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现场，被周恩来等中共高层和陈毅家属簇拥，慰问了陈毅的夫人、子女，与西哈努克亲王交谈，对陈毅和邓小平作了相关评价，并未提到毛泽东看到张伯驹挽联一事；二是寓真先生2013年在其所著《张伯驹身世钩沉》一书中说：“张伯驹当年从吉林败兴而归，黑人黑户，狼狈不堪，又怎么可能将笔墨挂到那种显赫的位置上呢？”

据此，张恩岭在该书《自序》中说：

张伯驹被聘为文史馆员的时间与毛泽东参加陈毅元帅的追悼会，完全是一个历史的巧合。但这一“巧合”的广为“传说”和部分作家的书写，却消弭了张伯驹真实生活中一段“薄薄大地，锥无可立”的辛酸处境及其对无情迫害的抗争，还有章士钊先生的仗义执言及周恩来总理的关怀等事实，一下子变成了不费吹灰之力的“传奇”。

历史给了文学家、艺术家无穷的滋养和无限的想像空间，但文学家、艺术家不能用无端的想像去描写历史，更不能使历史虚无化。文学家、艺术家不

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，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，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。戏弄历史的作品，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，而且是对自己创作的不尊重，最终必将被历史戏弄。只有树立正确历史观，尊重历史，按照艺术规律呈现的艺术化的历史，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，才能立之当世、传之后人”——对照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、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的这一段话，深感精准精辟之至。

1977年，“文革”结束后的第一年，国家进入新时期，张伯驹也迎来了80岁生日。1979年3月28日，张伯驹接通知到北京市委，在做出为其改正错误“右派”问题、恢复政治名誉的文件上签了字。接着，一顶顶艺术“桂冠”又纷纷向他抛来——“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”“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”“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”“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员”等。1981年，张伯驹1961年完成的著作《丛碧词话》终于有了正式出版发行的机会；他最为关心的“韵文学会”，经他这个80多岁老人到各个部门“多方奔走”，在他1982年去世后的第2年，终于在湘潭大学成立并创办了《韵文学刊》……这怎能不让人发出“春蚕到死丝未尽”的仰天长叹？

至妙至真，至厚至深。好一本《张伯驹传》！真切地刻画出张伯驹博大精深的思想境界，如实地展现出张伯驹卓犖不凡的艺术之道；横评出其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的真性情，纵论其求真求善求美的真风度……品读这样一部以求真之心书写至真之人的传记佳作，品味这样一位中华文化巨星风雨兼程的苦乐人生，怎能不让人心潮起伏、感慨万千。

我们分明看见——可敬可爱的张伯驹先生手持拐杖，披着霞光的余晖，微笑着，从碧绿丛林的历史深处缓缓走来……哦，他原本高大的身影，愈来愈高大、愈来愈巍然……（全文完）

# 偏爱焦墨写云山

——观郭保同作品有感

汉画女



画家郭保同先生是我比较关注的师友之一，多年来，他一直沉浸在书画世界中坚持不懈研习传统。他本是一位优秀的工笔花鸟画家，兼工田园山水，尤擅为家乡雪景造境，后来我发现他在朋友圈晒起了焦墨画。

焦墨画是中国画自古以来的一个画种，与水墨画相比是不使用水的，唯有笔法而无墨法，但却要求具有润泽感、层次感效果的绘画。明末清初时的程邃是以焦墨作画的，潘天寿曾这样评价他：“惟垢道人、个山僧，能得其秘奥，三四百年来，迄无人能突过之。”曲高和寡，历代画者对焦墨画多望而却步。

焦墨画既如此之难，郭保同却“明知入人眼，偏爱焦墨写云山”。郭保同之所以选择焦墨作画，我推测与他的恩师程大利、曾来德二位先生有关。程大利先生一直以来翰墨诗书、笔耕不辍，并对黄宾虹的画理画法深有研究；而曾来德先生除了从事书法教育之外，也用焦墨作画山水。

郭保同虽然近几年才入手焦墨山水，但却画得朴茂敦厚、古意盎然，既有四王一般的笔毫不苟且匠心独具，又有四僧一样的信手挥来与抒情写性，同时还遵循了黄宾虹的“五笔七墨”理论，因能铁画银钩积点成线，虚实之间墨点成面。他笔下的气息是流动的，用笔是会呼

吸的，让人在黑白的、混沌的、无色无染的世界中心游万仞，那种集笔精墨妙与粗头乱服浑然一体、苍茫浑厚与意蕴盎然跃然纸上的画面效果，颇有髡残之貌，因黄宾虹也是师法髡残的。

关于作画山水，荆浩有言搜妙创真，董其昌主张行万里路，石涛高呼搜尽奇峰打草稿，师古人、师今人、师造化和师心，哪一项他都不曾懈怠。他屡登名山大川，饱游沃揽，尽管形成的焦墨山水均是明显的“郭家”面目，却都是心游万仞的“随心”之作，是望秋云、神飞扬、临春风、思浩荡的性灵抒写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郭保同一直都只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，我把他列为习古队伍中的一员。因为无论从写实技巧的锤炼，还是以书入画理论的影响，再到笔墨个性至上的崇拜，及至如今对黄宾虹艺术的研究，他一路走来都心无旁骛一一涉猎。

他之笔法纯熟，与从小热爱书法大有关系。他幼年家贫，却喜欢写字，没有家用报纸，没有墨就用锅灰，还曾自制一根麻扎的笔，拎一桶水在马路上练，练得胳膊酸痛连筷子都拿不住。他临摹了大量的古代碑帖，日日临书于他已成习惯，一天不临便觉寝食难安。因此，他的绘画用笔全部来自书法用笔，方中见圆、圆中有方，这正符合了黄宾虹的平、圆、留、重、变之“太极”笔法要求。他深谙中国画讲究书画同源、善画者必擅书之道，但就用笔而言，他认为绘画比书法用笔更自由，变化更多。

联想到一生都在孜孜不倦临古的清晖老人王翬，他的那股韧劲与谦卑后来被批为是“三百年来使中国画落后”之人。我认可艺术发展的规律是变，应该提倡创新，可如果人人都挖空心思搞创新，又怎么会会有今天的文脉传承呢？

没有恒久的耐力做支撑，黄公望79岁就创作不出《富春山居图》，文征明不可能在85岁时还能画一手精美的蝇头小楷，黄宾虹也不会在80岁后还能“浑厚华滋”。大师们都是因为能坚守民族传统，能熬得住，才在晚年登峰造极。

郭保同始终坚定不移地守护着民族文化立场，遵循着中国艺术发展规律，他像许多大书画家一样，不停地画、不停地写，一天都不停。与前辈大师相比，郭保同正值壮年，加之他谦虚勤奋，又不急功近利，我认为他必大器晚成。

静心沉淀，并不代表他反对创新，“无为堂”主人实则是无为而为。先做一个求道、悟道者，以待他日厚积薄发，到那时，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

# 文明城市 你我共建

周口报业传媒集团宣

# 应奉上疏救三贤

杨箴廉

应奉字世叔，将作大匠应顺的曾孙，生活于东汉中后期，汝南南顿（今河南项城市）人。桓帝永兴元年出任武陵太守，当地少数民族造反，应奉采取安抚政策，战乱很快平息，地方得以安定。之后他又大兴学校，全面清除弊政，受到当地人民的称颂。后因事被免官。

会南中变起，长沙、零陵一带，盗贼聚众，进攻桂阳，艾县贼相继响应，焚长沙，掠益阳；零陵武陵诸蛮，复乘势蠢动，四出劫掠。御史中丞盛修，奉诏往讨，反为贼败。南郡太守李肃，弃城逃生。（主簿胡爽叩马谏诤，被肃杀死，朝廷捕肃处斩，荫恤爽子。）特令太常冯绲为车骑将军，督兵剿贼，绲见前时所遣将帅，往往被宦官陷害，因请中侍一人偕行，监察军费，乃命宦官张敞监军。前武陵太守应奉，有德及民，舆情翕服，绲调令同往。及抵长沙，便使应奉晓喻贼众，贼果释械请降；进击武陵蛮，斩首四千级，受降十余万，荆平定。绲归功应奉，荐为司隶校卫，自乞骸骨归里。

邓皇后因事被废，邓氏复败。前度辽将军李膺再起为河南尹，适值宛陵大姓陈元群自北海郡罢官归来，赃罪狼藉，膺表奏陈元群罪状，欲加惩治，岂知元群行贿宦官，反说膺挟嫌中伤，竟将膺罢官系狱。

前车骑将军冯绲，复入为将作大匠，迁官廷尉，案验山阳太守单迁，因他情罪从重，笞死杖下；迁为故车骑将军单超弟亲，中官与有关系，飞章构成罪，亦与李膺同为刑徒。

中常侍苏康、管霸，霸占良田美产，州郡不敢诘。大司农刘佑移书州郡，将二阙占有财产悉数没收。二阙哭诉桓帝，桓帝大怒，亦将刘佑下狱论罪，输作左校。太尉杨秉，正欲为三人讼冤，不意老病侵夺，竟致病死，桓帝赐陪茔葬。特进陈蕃为太尉。蕃入朝奉事屡言李膺、冯绲、刘佑三人冤屈，应即日赦宥，赐还原职。桓帝置诸不答，蕃复跪请再三，反复陈词，仍不见桓帝允许，乃流涕而去。

从此，宦官更加霸道，污吏更加贪婪。而冯绲三人，再无亲戚、无朋友，故旧也因怕牵连深恐避之不及。恰在此

时，司隶校卫应奉，独毅然上疏申讼道：昔秦人观宝于楚，昭奚恤莅以群贤，梁惠王玮其熙乘之珠，齐威王答以四臣；夫忠臣武将，国之心膂。窃见左校弛刑徒前廷尉冯绲、大司农刘佑、河南尹李膺等，执法不挠，诛举邪臣，肆之以法，众庶称宜。昔季孙行父亲逆君命，逐出营仆，于舜之功二十有一。今膺等投身强御，毕力至罪，陛下即不听察，而猥受谮诉，遂令忠臣同衍元恶，自春迄冬，不蒙降恕，遐迩观听，为之叹息。夫立政之要，记功忘失，是以景帝舍安国于徒中，宣帝征张敞于亡命。绲前讨蛮荆，均吉甫之功；佑数督临邑，有不吐茹之节；膺著幽，并，遗爱度辽；今三陲蠢动，王旅未振，易称雷雨作解，君子以赦过宥罪，乞原膺等，以备不虞，是臣等无所任翫望者也。

此疏感动了桓帝，便将三人赦罪，真乃功莫大焉！当时三贤入狱，如果宦官推波助澜，落井下石，追比朋党，殊延灭族，一旦兴起大狱，不知要冤死多少忠臣，屈死多少良将。应奉正直敢言，不怕杀头、不怕丢官，一股浩然正气，可歌可敬。

已而皇帝欲立继后，意在采女田圣，圣家世微贱，无功无德，独生得妖娆艳冶，姿态绝伦。桓帝好色，欲将田圣册立为继后。司隶校卫应奉，伏阙固诤，力言田圣不足为天下母。太尉陈蕃亦申言后宜慎选，不如册立窦贵人。窦是世家旧戚，功德卓著，足配圣躬。桓帝乃立窦贵人为继后。后为窦融玄孙，窦武女儿，即已正位中宫，父武得进为城门校卫，受封槐里侯。

后应奉见宦官专权，桓帝贪淫昏庸，不任群贤，便以病为由，辞官归里，隐居在故乡南顿。隐居期间，应奉追愍屈原以自伤，著《感骚》三十篇及《汉书后序》。等朝廷重新启用应奉时，他已病逝在家，死后葬于“百家铺”（今永丰乡）。应奉刚正不阿，不畏阉宦，有功于国，有德于民，他为救贤这一疏，使正人君子得以扬眉吐气，使宦官污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酣畅淋漓，大快人心。应奉这种舍己为人的高尚品格，以及勤政爱民的可贵精神，值得我们敬仰。